

§ 城市史研究 §

日本近世城市发展与社会关系的变化

许 晓 光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与旅游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6)

摘要: 日本近世城市发展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兴盛, 造成了日本社会关系的剧烈变化。町人因为从事商品货币经济而逐渐富有, 社会地位也开始提高。武士阶层因为脱离生产经营、居住到城市里依靠年贡生活而逐渐贫穷, 社会地位每况愈下。不少武士为了谋生, 不得不违反幕府法律从事商品经济, 从而与商人、豪农利益接近。农民阶级也出现分化, 少数农民因从事商品生产而成为豪农和町人, 大多数农民则愈加贫穷。维新前夕社会关系错综复杂的变化, 对维新后的社会改革带来深刻影响。

关键词: 城市兴起; 社会关系; 武士; 町人; 农民

中图分类号: K313.3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0766 (2010) 01-0022-08

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前期, 日本在全部约3000万人口中, 按社会身份计, 农民约占84%、工商约占6%、武士约占7%, 其他身份约占3%^[1]。随着近世城市的发展, 商品货币经济逐渐兴盛。到了明治前夕, 由于商业资本的触角伸向社会各个角落, 社会各等级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发生了剧烈变化。这种变化对日本由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至关重要。但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十分欠缺, 专门的研究论文尚未见到。本文拟根据有关文献, 对此问题作一探讨。

一、城市发展与町人地位的相对提高

日本近世城市的发展和商品货币经济兴盛的直接后果之一, 便是以商人为主的城市町人地位之变化。德川幕府后期的商人主要分成两类, 一类称为特权商人, 另一类称为乡间商人。二者皆可视为前期商业资本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前者是仅从流通方面抽取利润的典型的商业资本家; 反之, 后者作为批发制提前借贷资本家乃至制造业资本家, 某种程度上包含了与地方产业商品生产有关联的产业资本要素, 具有新性质的阶层^{[2][60]}。随着城市发展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兴盛, 一些农民逐渐脱离了直接的农业生产活动, 并移

居到农村附近的小城市, 逐渐变成了乡间商人, 实际是由农民转化为町人的一部分。“与城市里的基尔特(公会)商人相对, 农村里非基尔特商人(乡间商人)出现。至于作为他们新兴商人据点的‘乡间町’, 建立在原来的城下町的末端以及其外边。在这些‘乡间町’里, 主要让脱离农业劳动的手工业者和商人聚集, 待他们从事独立的经济活动时, 让町方之间屡屡发生纷争”^{[2][73]}。这些乡间商人从事的商品生产和交换, 被称为“农民的商品经济”。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里与封建领主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并具有特权的商人从事的经济, 被称为“领主的商品经济”。

乡间商人的兴起与城市发展并向乡村扩张其规模密切相关。对这种微妙变化, 思想家荻生徂徕(1666—1728)曾有描述:“城市与乡村之界限不明确, 农民就逐渐开始经商, 国家变得贫乏。农民变为商人, 此种情况自古以来便是国政上要大力避讳之事, 乃为重要之事。”^{[3][366-367]}即乡间商人由以前靠近城市的农民变化而来, 他们在实行“重农抑商”国策的传统社会被视为异己力量, 在我们今天看来, 实际上是日本社会出现的新阶层, 他们与传统农民不同, 主要以经营商品流通为生。但他们也与特权商人有区别, 因为他

收稿日期: 2008-09-11

基金项目: 教育部后期资助项目《日本近代早期非传统政治思想研究》(08JH Q0038)

作者简介: 许晓光(1955—), 男, 江苏扬州人,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学院教授。

们与封建统治政权之间不存在密切联系，主张所有的经商者在市场上进行自由竞争。他们往往与幕府对抗，例如在1860年，被称为地方货主的乡间商人为了对抗幕府，其中有人与企图分配贸易利润的雄藩联合。这些商人虽称“地方货主”，居住在小城镇里，但其本质仍为前期资本家，与“江户批发商”相同^[4]。这个阶层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日本最早的资产阶级分子。

这些商品货币经济经营者通过生产商品、从事交换和进行金融活动积累了大量财富。本多利明（1744—1821）曾描绘了当时商人的富有程度：“现在商人之跋扈令人吃惊。天下通用钱财几乎都流到商人手中，在富豪之中，仅有商人列名，武士之类丝毫不能加入其中。现在的状态就是，在社会上处于最下层的商人，实质上断然登上四民之最高地位。考察一下日本的金银在多大程度上流入商人之手。大体计算，将日本国十六分，若说其中十五分为商人之收入，剩下之一为全体武士的俸禄，也不为过。”^{[5][45]}尽管这里的描绘有些夸张，由此可见当时商人拥有的财富已经与法律规定其应当所处的社会地位极不相称。

当然，积累巨额财富者主要还是拥有特权的大商人。其典型事例可从元禄时代（1688—1703）幕府所没收的大阪大米商淀屋三郎卫门庞大财产清单中窥见一斑。没收的财产计有金屏风50对、宝石玩具船3只、毛毡373块、水金10050斤、大宝石273块、小宝石无数、金库2所、大判（金币）3000枚、小判12万两、银8500贯目、铜币75000贯¹、船150艘、仓库730栋、宝石库17栋、谷仓80栋、豆仓80栋、大坂住房28所、其他地方住房64所……^{[6][107注¹]}。本多利明也谈到日本最为富有商人的分布状况：“在各国也有相当的富商，其中聚居于从摄州至播州海岸十四五里之间的商人最富裕。大的从数十万石收入又分为几段，若说在摄州大坂，日本的富商悉皆聚集也不为过。在这种大坂的大富豪中有名为鸿池屋善右卫门者，是日本国无比之富豪，所持金银不可计数，收入可与十国左右的领地相匹敌。”^{[5][55-56]}这些町人在正常经商之外，还向社会各阶层放高利贷，这主要是由兑换商从事，也包括一些“札差”。兑换商最

富有的是鸿池、平野、天王寺等十家兑换商，他们组织起一个同业公会，称为“十人两替”（十家兑换）。元禄年间，鸿池贷款对象已超过20家大名。到1704年，鸿池向大名贷款总额已达14875贯，占总资产的73.5%^{[7][296]}。江户也有不少富有的兑换商，如中井新右卫门、村田七右卫门、三井次郎右卫门、竹原文右卫门、小野善次郎等^{[8][31]}。德川时代商业资本正是在三井、小野、鸿池之类的少数大商人和享有特权的贷款业者手里积累起来的。当时在江户、大阪两大城市以及京都、冈山等城市中，钱庄、兑换庄、札差等有了很大发展。1724年，在江户共有札差109人^{[7][296]}。札差本来是旗本的代理人，负责从江户幕府的米仓领取俸禄米，再卖给米店，但后来变成了江户的高利贷商人。他们以禄米为担保，向穷困的旗本贷款，同时也为大名融资，后来又变成以武士为对象的高利贷资本的典型^[9]。这种高利贷资本的势力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而迅速膨胀，如1789年，幕府在寛政改革中发布“弃捐令”，宣布一切债权债务无效，免除了武士对札差的债务1187808两黄金^[10]。高利贷资本势力庞大由此可见一斑。

如此巨富的町人阶层，当然不甘心于久居他人之下，一定会凭借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谋求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由于商人拥有巨额财富，并经常成为武士甚至大名和藩主等统治阶层的债权人，在人们眼中地位自然有所提高。人们开始像尊重武士一样尊重富商。他们也博得了工头、店员和女仆的忠诚。当然，在正式场合他们的地位仍然低于武士，但实际上他们已被看作是‘准武士’；事实上，他们中的有些人已被允许像武士那样使用姓氏和佩带刀剑”^{[11][73]}。在幕府统治时期，按照法律规定武士才能有姓氏，老百姓只能有名而不准有姓。根据丰臣秀吉颁布的“刀狩令”，只有武士才能带刀。但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的町人，却用金钱突破了这些限制，并用佩刀和使用姓氏来炫耀自己社会地位的提高。有些町人还花钱购买充当武士养子的权利。按幕府规定，养子也可继承苗字（姓氏）。井上三郎卫门在1853年提出了一件町人入武士当养子的费用报告书：“凡收养子一人而予以名义上的武士地位，

¹ 一貫约为3.76公斤。

年收米每一百石者，取金五十两，急收养子取七十至一百两。”^{[6][57注]} 萩生徂徕也曾谈到这种花钱购买下级武士担任吏职的状况：“因为下级幕臣御徒和与力¹之组头可以凭借判断自由任用下级官吏，故皆可用钱左右之。町人、百姓乃至像小工程的工头之类小吏等，皆可用钱购买与力之地位。还可花钱让自己之子成为武士之养子，作为获取旗本武士地位之中继点。现在此类事情极多。”^{[3][466-467]} 这充分说明商品货币经济像洪水一样冲击着传统的封建等级制度，町人阶层凭借金钱的力量正在努力改变和提高着自己的社会地位。

这种风气蔓延以后，引起了幕府当局的担忧。1710 年颁布的《武家诸法度》中声称：“近世之俗，定继嗣之事，甚至不论血统关系，而惟论财货多寡。此为不遵循人之道。”^[12] 当然，町人通过上述方式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其程度是十分有限的，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不平等的法律地位。这种改变只能在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中方能真正实现，因此这个阶层强烈希望有人作为他们的代言人，提出新的社会制度构想。

二、武士的穷困和社会角色的转化

社会关系变化的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武士随着城市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而日趋穷困，其社会角色也开始转化。德川幕府在日本实行兵农分离政策后，绝大多数武士长期居住城市。1635 年德川幕府规定，武士“无论高位低位，于其自身应用各物之外，不得购买货物囤聚，经商牟利”^[13]。武士脱离了直接的经济活动，又要维持较为体面的生活。城市的生活比起乡村生活来，其消费支出必定大为增加。根据幕府规定，封建大名因参觐交待制度，需要支付他们逐年增加的往返于领地和江户之间的旅费以及在江户的消费，据统计，到 19 世纪 30 年代，这种费用已占领主大名总支出的 50% 以上^{[14][385]}。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各藩大名的财政负担。封建大名常常入不敷出，逐渐陷于穷困状态。

萩生徂徕把武士这种穷困状态称为“旅宿境遇”：“武家集于江户城下度日乃为‘旅宿’。诸大名之家臣随从居于藩国之首府地，相对于江户城来，称这些武士在大名之食邑所。但只要不是

生活于他自己食邑所内，则也仍为身处‘旅宿境遇’。之所以如此说，乃因其在衣食住各方面之用品，即便一根筷子，都要花钱买来。所以他们之处境依然为‘旅宿境遇’。当武士们到江户城生活之时，要卖掉自己整年的俸禄米，用这些钱来购置日用。因其在一年之内会把这些东西消费尽，所以他们殚精竭虑、奉公敬上，得来之俸禄皆成为居住江户城之町人获得之利益。由此，江户町人势力乃日渐壮大。世界逐渐变小，物价不断上升，武士之贫困状况到目前已无可救药。”^{[3][403]} 这段史料生动反映出幕府实行“兵农分离”政策的严重后果，即让武士脱离农业生产经营，居住在城市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武士以前主要的生活来源取自于俸禄地的米谷收入。但大米价格并非恒常不变，而是随时波动的。由于大米附加值相对较低，在各种商品价格上涨时，米价上涨幅度往往低于其他商品，甚至有时呈现相对下降的趋势。唯物主义思想家山片蟠桃（1748—1821）对此也曾有所议论：“天下泰平，称米价低为善治，乃古今之通法。然而在如今，天下奢侈，诸物价腾贵，因此仅有大米价格便宜，武家和百姓应如何办呢？高兴者只有工商。”^{[15][264]} 米价的相对下降对武士的正常生存已构成了不小的威胁，而经商的町人却由此获利。

幕府曾力图扭转这种趋势继续发展。1761 年，为了阻止米价下跌，作为买米货款，幕府开始向大阪商人征收御用金^{[16][219]}，但仍无法遏制价值规律发挥作用。这样，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渐趋瓦解、城市发展和商品货币经济日益繁荣的情况下，大量依靠禄米生存的武士尤其是中下级武士迅速走向穷困。“‘与力’、‘同心’的俸禄很少，过去靠这些俸禄过日子也还容易些。但是近年来物价上涨，各方面都度日艰难，靠俸禄已不能养活妻儿。大家都在做些手工艺制品去卖钱，以补贴俸禄的不足，养活妻儿维持家用，勉勉强强执行公务”^{[3][365]}。低级武士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日益穷困，为了养家糊口，也为了能正常履行公务，不得不放下面子，违背幕府不准武士经商的法律规定，去做些小生意维持生活。而在商品经济冲击下，许多从事传统农业的小农破产，使武士的禄米难以保证按时按量征收上来。

¹ “与力”即幕府的小吏。

这就使武士在经济上更加捉襟见肘。

不仅下级武士日趋穷困，连上层武士大名甚至藩主也常常感到财政拮据，难以为继。例如“御三家”¹虽为知名大藩，但自享保（1716—1735）以来，藩财政危机加深。虽然作为弥补，采取了“改铸货币”、“强收租税”等措施，但不仅未获得实效，反而导致社会不安，矛盾激化，乃至引发农民起义。1797年，水户藩学者藤田幽谷（1774—1828）向藩主德川治保上书，指出了藩财政困难所带来的忧患：“而今国用岁穷，士风月衰，民力日困，而政之大体坏矣。朝四暮三，支吾目前，譬犹劳瘵羸疾之人。呼吸喘息，幸延旦夕。若一有外邪乘之，则虽有良医，不可复药。束手待其毙耳。”^[17]即财政困难极有可能导致幕藩体制的崩溃。

面对如此窘境，各藩学者强烈主张领主采取有力措施，阻止武士穷困现象的蔓延。如本多利明强烈呼吁：“现在武家穷困，乃武家政治建立之赖朝公以来所初见。当此重大之秋，更应改革诸方面，区别土、农、工、商、游民，必须按各自身份施行适当之制度。”^{[5]49}他认为武士的穷困是自幕府制度建立以来首次见到，而改变的方法是强化等级制度，按不同等级区别施行对策。

各大名和藩主为了解决财政拮据，也想尽了各种办法。首先是削减自己所能控制的下级武士的俸禄。在天保改革的当事者德川齐昭统治下，甚至采取了将家臣俸禄的一半“借”上去的非常手段^{[2]50}。西方学者也曾对此状况进行过研究。如德国人马丁·兰明认为，幕末中级武士的年均收入为100石，大致相当于一个富农的收入，全体武士的平均年收入在35石以下，与农民收入差不多。但是大名因财政困难而不能不削减武士的俸禄。这种削减名义上是改组藩财政的贷款，但却往往成为武士收入的长期削减^{[6]19注}。最终导致下级武士更加贫困。

第二种办法就是企图让武士回到农村去经营农业以摆脱贫困。荻生徂徕建议说：“要改变旗本武士们之穷困，如前段所述，必须让武士生活在自己之俸禄地内，以改变旅宿境遇。应当通过制定礼法制度，救助其穷困。但要使其居住于其

俸禄地内，有必要用心策划使其地方经济繁荣。”^{[3]434}然这不过是作者的一厢情愿，要将其付诸实施，就必须违背已实行多年的兵农分离政策；让已习惯了城市生活的武士重新回到乡村去经营农业，也几乎是无法实现的。

1788年，针对武士阶层日趋穷困的现实，大阪怀德堂教师中井竹山（1730—1804）向欲实行改革的松平定信（1758—1829）提出了著名的、被认为是“宽政改革”理论指导的《草茅危言》。其中说明武士破产已危及幕藩体制，提议给武士以恒产，以稳定幕藩统治的基础：“中国的孟子曾说，若无恒产则无恒心。尽管如此，仍主张虽无恒产仍持续有恒心者为武士。但是，此想法在现世已不合适。现在之士，还是若无恒产则失去了恒心。因此，必须实行给予武士恒产的政治。”^[18]但此项建议并未得到实施。

藩主们为解决财政拮据的第三种办法就是借贷。借贷的对象既有下级武士或家臣，也有町人中的商人或高利贷者。不少大名为裁减开支，往往扣发家臣的部分俸禄，这称为“半知”（半俸）制度。虽然名义上是向武士借贷，以后再补齐，实际上一概不归还。所以借贷只是减俸的委婉说法而已。向町人借贷也同样无法按时偿还。太宰春台（1680—1747）对此状况描绘道：“近来诸侯，无论大小，皆为国用不足，贫困已极。借用家臣俸禄之事，少则十分之一，多则十之五、六也。如此若仍不足，便向国民贷款救急。若犹不足，便向江户、京都、大坂之富商大贾借钱，此事年年不已。仅借罕还，子又生子，宿债增多，已不知有几倍。昔日熊泽了介²曾言，海内诸侯借钱之数，已为日本所有金钱之百倍，乃宽文、延宝年之事也。从那之后经过七十年，今应为千倍。今诸侯若如数偿还借款，有名无实之钱由何处出耶？”^[19]这种利上加利的借贷导致封建领主的债务超过日本全国收入的上千倍，实际上永远无法偿还。既然无法偿还，封建领主们便设法赖帐。本多利明指出：“近来在诸侯中，不论大小，没有不从富豪处借钱者。商人为获利而融通资金，同时所有的方法皆为承诺决不拖延债务。但首先不从心底改正（奢侈），不管怎样仅表面节

¹ 指德川将军一族的尾张藩、纪伊藩和水户藩，在亲藩中地位也很特殊，辅佐将军，并可继承将军职位。
² 熊泽了介即著名儒家熊泽蕃山（1619—1691年）。

约，也不能奏效。作为诸侯，不外乎增加领内农民租税，借贷向家臣支付的俸禄。不用说，自古以来已经有这两种作法。而一旦向商人借钱，最终无论如何也要玩弄手段巧妙地使债务减免。”^{[5][33][34]}昔日趾高气扬的武士阶层，现在因生活穷困、财政拮据而被迫低头，去向四民中最低等级的商人借贷，这无疑是幕藩体制下社会关系的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商人和豪农阶层的崛起，使日益穷困的武士感到极大不安。武士的穷困不安，包含了极为重要的问题。这种不安结果由来于直接生产者农民的商品农业、农民工业的发展显著兴起。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正是这个阶层，与统治者相反，还约束统治阶级，或用钱购买他们的特权地位，对希望拥有作为封建统治者的名望的商人，是本质的、否定的、对立性存在。”即城市发展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兴盛，客观上导致社会各阶层地位的此消彼长。当然，作为没落的武士阶层，主观上“谁也不会希望由其他封建统治者取代自身地位，谁也不愿封建统治本身的地位被否定”^{[2][51]}。而借贷措施正反映出封建领主挽救武士阶层和封建制度日趋衰落的心态。

以上办法均不能解决武士穷困和藩财政拮据，最后只能采用第四种办法，即回到传统的向农民和商人加倍征收贡赋的策略上去。山片蟠桃指出了这种横征暴敛的危害：“为此公家杂费不足，日益虐待百姓，不得不加重收敛。因害怕征敛，农家子弟只得躲在家或到城市务工，否则只能向他国离散。由此，荒废之地增多税收日日减少。所以，随着收敛愈益加重，最终导致百姓穷困而成为骚乱之源。”^{[15][23]}他在此提出了警告，加重压榨农民以解决公家杂费之不足，最终只能导致农业经济崩溃和人民骚乱的危险性。幕末著名思想家横井小楠（1809—1869）也曾论述了因交替参觐导致各藩财政困难，不得已向各下级武士“借”俸禄并压榨农商的情况：“轮番参觐之初便要支付今日诸用，金银之费逐渐增多，但金银并非共同增加。国中人口虽增多，但土地仍如古昔。消费处多而产出处少……诸大名各闭锁一国一郡，有利于己则不顾害他。利政无处不聚敛，若共难补国用之不足，不得已借诸士之俸

禄，压榨豪农富商，吸取小民膏血，也不得不为今日救急之事。农商也为此遭受疲弊，故愈益抬高物价欲免其穷，以此其弊又波及士，至交互困穷。”^[20]这种横征暴敛不但不能解决武士穷困和藩财政的拮据状况，反而在造成农商凋弊的同时，也迫使农商抬高物价从而导致武士进一步陷于贫困深渊。

总之，德川幕府中期以后，城市中社会各阶层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城市的消费生活日益丰富多彩使商人大发其财，尽管他们在身份上处于最低层，但是武士在他们面前却也抬不起头来”^{[21][18]}，另一方面，不少武士为了摆脱贫困窘境，开始不顾法律规定，把主要精力转向从事商品经济。为了解决生计的武士通过经营工商业逐渐与商人趋近甚至混同。根据文政年间（1818—1829）的记载，江户的 250 家商人中，原来出身于武士家族、或本人就是武士者有 48 家^[22]。根据三井高房（1684—1748）¹分析，京都町人石河自安的祖先是尾张国犬山城城主，高屋清六祖先是旗本，平野祐见祖上四代皆为幕府从事朱印船海外贸易的代官，三木权大夫出身于浪人家庭，等等^[23]。还有些武士甚至通过经商发展为批发行的资本家。如从 18 世纪中叶开始，仙台藩的最下级武士“足轻”就从事着扎发髻绳、制造提灯、雨伞、笔等手工生产，他们还经营了 13 家扎发髻绳的批发行，这些批发行下面有 60 家左右的武士从事捻绳，并在家里雇佣了更贫困的足轻作裁纸工^{[24][151]}。不少大名和藩主为了过上奢侈生活和解决藩财政拮据的问题，也纷纷转向市场经济，已如前述。这样，武士阶层就在不知不觉间使自己的利益与商人、豪农接近，转变了自己的社会角色。这对明治维新后掌权的中下级武士推行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居住在城市的武士因教育条件的优越，许多人成为知识分子。“武士阶级不再随时准备战斗，因此他们已经转变为德川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官僚。同时，他们成了知识学问的传播者，并且与少数农民和市民一起，组成了知识界”^{[11][93]}。如后来明治初期组成著名的“明六社”的福泽谕吉等思想家就出身于下级武士。

¹ 三井高房为著名的三井家族第三代宗主。

三、农民阶层的分化

城市发展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兴盛也造成了农民阶层的分化。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农民分为若干成分。人数最多的是“本百姓”，在17—18世纪前期，本百姓约占全体农民的90%^[25]。他们承担着向幕府和藩缴纳年贡和服劳役的主要义务。每一户约5人，占有田地的收获量大约为大米10—15石^[26]。德川幕藩体制以“农本主义”为基础，将农民束缚于土地上，并剥夺了他们的一切自由，只让农民有履行按时交纳年贡的义务。另外还有大约10%是所谓“水呑百姓”，即无地农民，靠佃耕土地或打短工为生。近世中期以后，农民阶层开始出现分化。

尽管幕府法律规定，农民不得随意迁徙和更换职业，以保证向武士政权缴纳的年贡不致减少。但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趋利乃人之本性。在生产力逐渐提高的前提下，一些农村的农民由于经营得法，产品有了剩余，开始投放市场交换，实际上已开始从事商品生产活动。当偶然的交换成为经常以后，农民便开始转向为了投放市场交换而专门进行某些作物的生产，即商品农业生产。在这一过程中，农民中出现了相对富有的阶层。还有些农民原本就在乡村担任了村官，有些是武士派到农村进行征税和管理的“里正”。这些人利用职权获取商品生产带来的利益而逐渐致富，被称为“豪农”。他们通过“质入”（典当）贫困小农的土地，或亲自经营，或雇佣农民进行耕种。后来便成为寄生地主。据统计，从1864—1870年，在五目、上野、半在家、沼上、成冈、弥五岛6个村里，217家农户中年收入在25石以上者仅有9户，其中70石和80石以上者各有2户。绝大多数收入均在20石以下^[27]。这些较高收入者便是所谓豪农。

豪农在经营中由于受到市场规律影响和幕藩统治的挤压，往往不能按正常方式经营，不少人被迫转行。如摄津国武库峻西昆阳村的氏田家，主要经营大米、棉花、油菜籽。毛收益中各项支出的百分比为：肥料1784年16.8%，1829年上升到24.8。雇工的工资1788年为110—125分银，到1813年上升为175分，1832年上升为220分。成本上升，加上在农产品商品化过程中，受到幕藩领主和特权商人的压迫，市场也有局限。

这样的制约条件迫使豪农转向到土地出租、金融等方面。或者与特权商人加强联系，向当地掮客转化。概言之，就是豪农的寄生地主化。“他们不能扩大制造业经营，便作为批发制预借资本，寄生于小生产者”^{[16][235]}。

正因为豪农不断地向地主转化，所以日本学术界常常在观念上将豪农与地主两种成分混用。豪农也有各种类型，日本学者佐佐木润之介将其分为几类：从生产角度分类包括普通地主中基于佃耕关系的地主、地主亲自经营者、商品生产的经营者和垄断商人。从金融方面分类包括小生产者和向小商人放高利贷者；从社会方面分类包括同宗族的最有势力者、保有最大规模土地和具有经济基础的富裕农民、村共同体的代表人和村官阶层，他们在村内与其他村官，在村外与其他村的村官，以及地主豪农之间有经济社会结合关系。这样，豪农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向成为商人、高利贷者、地主的方向延伸。但是，豪农经营由于幕藩制市场构造的特殊性质，在天保时期遇到矛盾，豪农用抛弃下层农民的方式，实行经营的重新组合。其结果，产生了与豪农对峙的半无产者阶层，即必须靠出卖劳力维持或补充生活的农民。渡边尚志对豪农的分类为：1. 草莽志士型，这个类型是走出本村，投身政治，作为草莽志士奔走于尊王攘夷运动的豪农们。他们在村内经营不善，基础薄弱，不能保障贫农、雇农的生活安定，不断受到改造世道运动的威胁，由此决定参加村外的政治活动，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并由此力图在村内稳固地位和开展经营。2. 在村型豪农，活动的基础在村内，以不耽误自己的经营为前提。维持和安定贫农、雇农的经营，重视村落共同体的重组，即有在利他中追求私利的特征。前者与后者不同，他们以扩大自己的经营、追求利益为核心目的，不太关心贫农阶层的经营安定等村落共同体的全体问题。欲把村落共同体作为自己发展的台阶^[28]。

上述分类大体勾画出了近世豪农在日本社会的活动和作用。豪农顺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代表了当时日本农民发展的方向。后来越来越多的豪农基本上脱离了直接经营农业，将土地出租给佃农耕种，自己变成了所谓寄生地主。甚至还有一些人居住到江户这样的大城市里，从事起其他行业。正如荻生徂徕描绘的那样：“在乡

村，拥有大量田地之百姓，不亲自经营农业，田地皆让佃农耕种，自己模仿江户城房地产出租者的生活，此种人近年逐渐增多。”^{[3]380}还有一类农民通过从事商品流通，离开农村居住到城镇，成为所谓乡间商人，实际上已改变了农民的身份而成为町人的一员，他们与町人有了共同的利益诉求和政治话语出发点。同时这些经济地位改变的豪农也与町人一样，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如用金钱购买以前只有武士才能拥有的“苗字”（姓），1855年，播州黍田村担任村长的七郎兵卫家就获得了稻冈这一苗字^{[4]426}。

但不可忽视的是，大多数农民比以前更加贫困。这一是由于客观规律的作用，小农经济本来就经不起天灾人祸的打击，很容易向两极分化。二是由于城市兴起后，商品货币经济逐渐向农村渗透，农民向武士交纳年贡米时，货币地租占了很大比例。农民必须将农产品投放市场交换，这就必然受到商人的多一层剥削，因此自己留下的收入更少。据粗略统计，到明治初期，农产品商品化率在日本全国已达48%，畿内相对发达的摄津、河内、和泉地区则接近59%^[29]，近世幕末的农产品商品化率大致如此。另一方面，农民到市场购买的生活和生产资料也越来越多。如18世纪20年代，仙台藩耕种1町土地的农民家庭，在33贯589文总支出中，货币支出为20贯936文，占61%；18世纪末在摄津经营3町土地的农民家庭，在5594匁的总支出中，货币支出为3851匁，占64%^{[24]72-73}。

被卷入市场经济的小农除了要继续承受天灾人祸威胁之外，还要承担由于商品货币经济带来的风险。如农产品价格下跌、农用物资价格上涨，势必造成小农的贫困乃至破产。“近世中期以后，作为被纳入全国市场一环的特产物生产地区，在受到同地区急剧的货币经济的洗礼时，作为小农经营，无论在生产力上还是市场应对能力上都未成熟，弱小经营不得不首先崩溃。此时期北关东农村的荒废现象，是在同地区作为特产地

形成之际，遭受了急剧的货币经济化，从自给性农业与被迫卷入他律性的、强制性的商品生产和流通不可分离地联结在一起所产生的现象。荒废现象的惊人程度简直就是象征着货币经济化进行的惊人程度”^[30]。一般说来，商品货币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农民分化以及小农破产情况就越严重。到德川幕府统治后期，发达的畿内地方许多村小农破产失去土地者已达到50-70%，在西南的长州，无地贫农约接近50%，在相对落后的关东地方，无地贫农约有10-20%^{[24]78}。

佃农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以前佃农是直接向领主武士缴纳地租，但随着武士贫困化现象日趋严重，许多土地被豪农或新地主以“质入”的方式获得。这样一来，佃农不仅要照旧向领主缴纳年贡，还要向实际的地主交纳地租。据推算年贡大约占收成的37%，地租大约占28%，农民自己所得不到35%^[31]。

在幕末，这后两种农民构成了整个农民的绝大多数，而且呈现日益贫困的趋势。为改变这种贫困状况，农民们发动了以“改造世道”运动为代表的暴动和起义。但这种运动并未提出新的政治改革构想，只能提出与历史潮流相悖的回归小农生产的“理想”。

结语

日本近世城市的发展与商品货币经济的兴盛，导致了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化。町人势力的崛起和农民阶层的分化，武士阶级的整体衰落，充分反映出商品货币经济正以其不为人们主观意志左右的巨大作用改变着各社会力量的对比，冲击了传统的封建等级秩序，重新调整着各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也逐渐改变着人们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部分中下级武士为了谋生，通过参与商品货币经济活动，其利益诉求逐渐与町人、豪农接近，这无疑为即将出现的日本社会改革和新思想的诞生，奠定了新的社会基础；对维新后的社会改革也必将带来深刻影响。

参考文献：

- [1] 伊藤忠士. 近世領主權力と農民 [M]. 東京：吉川弘文館，1996：3.
- [2] 入交好脩. 幕末の特權商人と在郷商人 [M]. 東京：創文社，1977.
- [3] 萩生徂徠. 政談[M] // 尾藤正英編. 日本の名著 16・萩生徂徠. 東京：中央公論社，1974.
- [4] 遠山茂樹. 明治維新 [M]. 東京：岩波書店，1951：117.
- [5] 本多利明. 經世秘策：下[M] // 同全集編輯会. 大日本思想全集（11）. 東京：吉田書店，1832.

- [6] 诺曼. 日本维新史 [M]. 姚曾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 [7] 本庄荣治郎. 日本社会经济史概说 [M]. 東京: 日本評論社, 1959.
- [8] 藤村通. 近代日本經濟史 [M]. 東京: 風間書店, 1956: 31.
- [9] 楠西光速, 等. 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 [M]. 田静先,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3: 15.
- [10] 龍川政次郎. 日本社会史 [M]. 東京: 創元社, 1954: 322-323.
- [11] 森島通夫. 日本为什么“成功” [M]. 胡国成, 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 [12] 德川幕府. 武家諸法度・文照院[G] // 石井良助校订. 德川禁令考: 前集第一. 東京: 創文社, 1981: 69.
- [13] 德川幕府. 諸士法度[G] // 石井紫郎校注. 近世武家思想. 東京: 岩波書店, 1995: 465.
- [14] 小松和生. 幕藩制解体期の経済構造 [M]. 大阪: 清文堂, 1995.
- [15] 山片蟠桃. 夢之代[M] // 源了圓, 編訳. 日本の名著 (23). 東京: 中央公論社, 1977.
- [16] 永原慶二. 日本經濟史 [M]. 東京: 岩波書店, 1980.
- [17] 藤田幽谷. 丁巳封事[G] // 今井宇三郎注. 日本思想大系 53·水戸學. 東京: 岩波書店, 1973: 374.
- [18] 童門冬二. 幕末日本の経済革命 [M]. 東京: 株式会社 TBS ¶ È «, 1990: 83.
- [19] 太宰春臺. 経済録拾遺[M] // 賴惟勤校注. 日本思想大系 (37) 徒徳學派. 東京: 岩波書店, 1972: 45.
- [20] 横井小楠. 国是三論[G] // 佐藤昌介他編. 日本思想大系 (55). 東京: 岩波書店, 1975: 439.
- [21] 吉田茂. 激荡的百年史 [M]. 孔凡, 张文, 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0: 18.
- [22] 本庄荣治郎. 日本社会经济史 [M]. 東京: 改造社, 1928: 359.
- [23] 三井高房. 町人考見錄[G] // 中村幸彦校注. 近世町人思想. 東京: 岩波书店, 1996: 178-180, 204.
- [24] 楠西光速他. 日本資本主義の成立 (1) [M]. 東京: 東京大学出版会, 1980.
- [25] 羽仁五郎. 幕末における社会経済 n 態、階級關係と階級鬥爭 [M] // 日本資本主義発達史講座. 東京: 岩波書店, 1932: 20.
- [26] 野村兼太郎. 日本经济史 [M]. 東京: 有斐閣, 1957: 26.
- [27] 福島大学経済学会. 寄生地主制の研究 [M]. 東京: 御茶の水書房, 1978: 134 (表).
- [28] 渡辺尚志. 近世村落の特質と展開 [M]. 東京: 校倉書房, 1998: 145-146, 155-157.
- [29] 中村哲. 明治維新の基礎構造 [M]. 東京: 未来社, 1968: 156.
- [30] 须永昭. 幕末維新期の農業構造 [M] // 津田秀夫編. 近世国家の解体と近代. 東京: 塙書房, 1979: 20.
- [31] 平野義太郎. 日本資本主義社会の結構 [M]. 東京: 岩波書店, 1934: 28.

The Impact of the Growth of Modern Cities on the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Japan

XU Xiaogua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Tourism,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6)

Abstract: The growth of the modern cities and the merchandise economy made remarkable impact on the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Japanese society. The townsfolk class became wealthier because of their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their social positions started to be promot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Samurai were away from the industry and businesses and relied upon annual tributes. They gradually became poorer and lost their social rank. To survive their life, a lot of Samurai participated in business activities, which violated the law of the Shogunate government, and were close to the interest of businessmen and rich peasants. The farmer class began to split, too. Some farmers worked their way into rich peasants and townsfolk, while most became poorer. The complicated social relationship changes at the eve of the Restoration mad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social improvement during and after the Restoration.

Key words: The Growth of Cities; Social Relationships; Samurai; Townsfolk; Farmers

(责任编辑: 黎原)